

評介

許秋煌

「近代美國外交家」

學生英文雜誌社出版 66年8月初版

黑格爾在其「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 一書引言中說：「各國民族及政府從未由歷史中學得任何東西，也未依據由歷史所獲得原則行事。」美國的崛起及強大，對於世界安全的維護曾經表現出無比的毅力，領導民主國家繼續不斷的抗拒暴力集團的侵略。自踏入二十世紀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一直影響著無數國家的命運，使衆多地區的人民在廢墟中，再度建立起一個新的家園；相對的，也導致千萬人民陷於火海之中或被迫流落異鄉。有時表現出泱泱大國的风度，有時却顯得力不從心之感；當然，在決策抉擇之間，受到人事物複雜變化的牽制，以及國家利益的考慮，無法一味以本身的利害得失給予論定。況且外交決策的過程，就含有很濃厚的價值判斷，凡事以理想化的角度去評析，都會導致跟實際狀況有著一段很漫長的差距。因此，美國外交政策的不一致，正說明歷史事物的轉變，不會是一成不變的；奢望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或規則化，反而是一種苛求。

「近代美國外交家」的內容是採取論文集的形式，共選取十位對美國開國以來在外交上有重要貢獻的人物。包括：提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維納德·斯戴德（Willard D. Straight），武德魯·威爾遜（Woodrow Wilson），亨利·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斯坦黎·霍恩貝克（Stanley K. Hornbeck），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狄恩·艾契遜（Dean Acheson），約翰·杜勒斯（John Forster Dulles），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亨利·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其中有四位是總統，四位是國務卿，另外二位是跟我國有特殊關係的外交官。這十個人依照時間上的安排，是從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七五年止，連串起來就是一部以人爲中心的美國近代外交史。

提奧多·羅斯福

羅斯福一八五八年出生於一個具有社會地位和相當財富的家庭，接受所謂典型的上層階級教育——家庭教師、格羅頓（Groton）中學、哈佛大學三階段。由於家世的權利，青年時期就會經遨遊歐洲和近東，成年後更以堅定的意志克服了嚴重的哮喘病，對他的人生觀有着很大影響。

十九世紀末達爾文「優勝劣敗」的原則，在美國

掀起一陣狂熱的風潮，也使得羅斯福相信「白種人的負擔」，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責任。「強權即公理」的論調左右了他對國際事務的看法，認爲只要國家還繼續存在，除非有強大的實力作爲後盾，一切的崇高理想都毫無價值可言。

在羅斯福以個人爲中心的主政時代，外交政策的安排及決定，不僅國會無法過問，連國務院亦被排斥，「網球內閣」（Tennis Cabinet）的出現，表明外交事務的權威正集中於白宮主人的手上。對於「門

戶開放」(Open Door)，所有國家在中國有相等商業機會的觀念，他是一位堅定的支持者；更重要的是，他把日本視為門戶開放政策及亞洲權力平衡的保護者。他的構想是利用日本保護美國和世界的利益，而日本在中國之所以享有特權，如美國在拉丁美洲一樣。

一九〇五年的摩洛哥危機，羅斯福在權力平衡的運用上，發揮了卓越的能力，化解了一次可能引起大戰的浩劫。以現實主義為基礎的外交政策，一方面要對抗傳統和冷淡，另一方面却加強了世界對美國的認識。羅斯福在外交政策的特色，正如他所說的，「就抽象的觀念而言，我對於任何歐洲國家都無敵意，但我却是一個徹底的美國人，所以我反對任何虧待我的國家。」

維納德·斯戴德

斯戴德的一生的經歷，跨越羅斯福、塔虎脫和威爾遜三任政府，雖然他只是國務院的一位官員，却是一位偉大夢想的夢想者和富有雄心的實現者。

在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學習建築時，斯戴德就是具有英雄主義色彩的英國詩人吉普

林(Rudyard Kipling)的信徒。他把一切的生活設想為一種競技(game)，一種在敵對的奮鬥進行中，以超越或擊敗其他競爭者為其目的。放棄或退出競賽，在意義上就是精神上的懦弱。

一九〇一年畢業後，他接受中國海關的一項職務，成為總稅務司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的私人助理和機要秘書。在這段經驗中，確信中國的發展將決定世界的前途，甚至預言，「在今後一百年內，中國可能是美國最危險的敵人中的一個，或最強大的友人中的一個」。他認為滿州是「整個中國的鎖鑰」，在這個心理的認知上，使他相信在中國命運的改造，他可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湖廣鐵路借款」是第一個由他引入中國的美國資本，美國也因此而加入三國銀行團，但由於英日的猜疑，以及日俄協約的打擊，美國政府竟處於進退維谷的局面。

斯戴德參與各國在中國的大競賽，而且隱約的以一位建造者自居，但他所採取的並不是一種友好的態度，而是相信在中國市場的取得，有助於美國在經濟上的發展。對「中國復興」負有偉大的責任，確實是斯戴德一個偉大的夢想。

武德魯·威爾遜

出生於宗教家庭的威爾遜，對於善惡之間有一條明顯的界限，認為他有獲得真理的特權和替上帝及人類服務的特殊義務。受長老教會所薰陶的特徵，如紀律、愛好秩序、積極等，在日後總統的任期內表現無遺。他曾經做了十七年的大學教授，然後擔任八年的普林斯頓大學校長。

威爾遜的外交政策是以他的人生哲學為基礎，在外交事務的指導中，他堅持一切要由他自己控制，甚至相信美國在他的領導下，可作為世界改革的工具。基於家長主義（Paternalism）的優越感，深信可引導未開發國家去向一種高水準的社會和政治發展。而美國正是此種光輝的榜樣。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威爾遜正如多數的美國人，希望美國能置身其外。對於同盟國雖保有某些程度的同情，但保持中立並維護美國的權益，才是他的職責。而調停就是一種基督徒的救世態度和追求和平的最佳途徑。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戰爭結束，他在和會中提出

國際聯盟的建議，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大會議，可公開討論，解決領土爭執、軍備、商業或其他足以威脅和平及正義的問題。無任何國家反對國際聯盟。他曾經這樣宣佈着說：「舞臺是已經佈置好了，命運也已經顯示出來。它並非出自我們所構想的計劃，而是上帝的手引導我們走向這條道路。」但是國會的杯葛及反對，使得他遭受一次慘敗。

威爾遜企圖使國家成為一種改變的工具，而引導到一個和平及較好世界的途徑，雖然失敗了，他的努力則變成了美國外交理想主義的象徵。

亨利·史汀生

史汀生在七位總統之下歷任公職，前後達四十年之久。擔任過國家檢查官，二度出任陸軍部長、菲律賓總督和國務卿。他認為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應該接受一種更明確和更重要的角色，在角色扮演的意識裏，將使得美國成為更有榮譽和希望的國家。

他把一九一四年的戰爭看作是民主與極權之間的鬭爭，如果美國不主張人道和正義，就如出賣它的生存權。他相信他的國家對戰爭的立場，應該是超越中

立權利的保護，否則民主國家的努力目標，將隨之而逐漸消逝。由於受到前幾任總統的影響，史汀生對家長主義亦抱持相同的看法，他感覺到美國對兄弟之邦的國家，應當有監護之責，幫助他們走向民主政治的途徑。

當日本侵佔滿州後，他即採取所謂不承認（nonrecognition）主義，指責日本的侵略是反道德的行為，美國政府絕不承認這些違反條約的行為。「不承認」原則，是多數美國人所擁護的政策，它只是對日本的侵略表示激憤，但對受害者並沒有作任何的承諾。

史汀生一直主張增強行政權力，一個「真心和充分享受權力運用」的人才具有偉大的資格。對於世界和平的誠摯希望，使他相信一種新秩序基礎的建立應該是必要的。他依然是「權力即實力」的接受者。

斯坦黎·霍恩貝克

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美國在遠東政策的全盤計劃，霍恩貝克是一個幕後決定政策者。他的主張、建議、甚至行動都影響美國在遠東的政策，是美國在遠東

政策的戰略和戰術的具體代表。

一九〇九年他在威斯康辛大學拿到歷史和政治科學的哲學博士學位後，即受聘到中國「杭州省立學院」教書，這個機會改變了他的一生。他是一位刻苦努力的人，律己甚嚴，也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他個人對外交的看法，並非如一般人所形容的，像一盤棋；「棋是在公開的棋盤上來下的，沒有欺詐或撒謊的機會，外交則並非如此。」同時也是一位民族主義的堅定信徒。

霍恩貝克對中國的感情，是基於有限度的同情。雖然對中國情勢的混亂表示惋惜，但當和美國的利益衝突時，依然主張壓抑中國的利益。一九二八年以前，他認為中國不能符合一個國家的標準，因此，不能享有主權的權利和履行主權的義務。當日本成立「滿州國」時他不曾認真的考慮對日本採取強硬手段，他的建議是以避免刺激日本為重點，所以任何支持中國的聲明都是應該避免的。他認為應告訴中國人，「美國對於扮演聖誕老人的角色，已經感到非常厭倦，我們所需要的是借債者真正有能力還債的證據。這一個原則，後來也成為羅斯福政府的基本政策。」

當考慮到對日本採取行動時，他亦非基於人道的理由，而是因為日本已威脅到美國的安全。至於一九三八年對中國的貸款，他的動機是使中國能牽制日本並消耗其實力，這遠比美國本身對抗一個強大的日本更是值得。霍恩貝克的遠東政策觀點，使得美國現實主義更趨於現實。

富蘭克林·羅斯福

美國史無前例連任四次的羅斯福總統，若依照機械化的公式推算，他是一出生就註定要當總統了。跟他的堂哥提奧多·羅斯福總統一樣，幼年起即接受「東部當權派」(Eastern Establishment Education)的教育，同時對疾病戲劇化的奮鬥，也使得他贏得無數的同情和敬佩。他一生事業的經歷：紐約州議員、海軍助理部長、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二任紐約州長。一九三二年以壓倒性的勝利登上總統寶座。羅斯福在外交政策的態度是標榜自我中心，他認為其他國家必需接受美國精神上的領導，因為對他們而言，這樣做是合理的，必需的和現實的。他討厭官僚式的硬式和機械程序，專斷的行使領導權力。同樣

基於家長主義的心理，為了使西半球的團結成為事實，他努力追求一種集體安全的條約，因為美國不能置身「國際秩序和法律的崩潰」於事外。對侵略者主張採取集體行動對抗。

一九四〇年第三度當選連任後，依照他的構想，是把美國轉變成為「偉大的民主兵工廠」，而不是直接介入戰爭，這種意願主要是來自民間避免戰爭希望的反映。由於美國工業和技術資源的投入戰爭，使得美國從英國手中接掌了領導世界的責任；同時，當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發生後，民主集團最高統帥的角色，就等着羅斯福去扮演。

雅爾達協定的簽定，雖然有人認為，那是確認以前已達成的決定，羅斯福僅是使那些信念和意見具體化而已。但批評者仍然認為，這是「勝利博士」(Dr. Win the War)的最大敗筆。羅斯福最大的目標是解除所有國家的武器，無論是勝利者或失敗者，依家長主義的模式重新建造這個社會。這個架構的態度，形成了美國戰後處理問題的基本藍圖。

狄恩·艾契遜

從童年宗教背景給與的身份意識，使得艾契遜具有近似宿命主義的趨勢，以及一種堅忍主義的哲學。從哈佛大學法律學院畢業後，他即跟隨大法官布南德斯（Louis D. Brandeis）充任書記。這位大法官認為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大部份是賴於少數人，只有他們的意志和智慧能够抗拒或克服羣衆的無知和愚行。

艾契遜上任國務卿的第一年，產生幾件大事：中國大陸的淪陷，蘇俄原子彈的成功，以及西方反應的麻木，都使得他異常沮喪。他看清楚，蘇俄政策已在世界權力盆地中逐漸的擴張，蘇俄所尊重的只有實力，西方國家如果不能使本身變得統一、強大，將無法令克里姆林宮停止對西方的壓力；無實力作爲後盾，根本就難以顧及需要。一方面畏懼西方的弱點和不團結，另一方面又深信圍堵行動的治療價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成立就成爲他的主目標。

正值國內外強烈要求美國保證臺灣安全時，艾契遜則拒絕美國的保護延伸到臺灣，以免「把中國人民所必須發生的憤怒和仇恨，從俄國人身上轉移到我們的身上來」，而主張重建日本，使成爲阻止共產黨的

一種對抗力量。這正是圍堵理論的論點。於有限度的戰爭，是他戰略的邏輯，在韓戰中又再度出現，導致美國在亞洲政策成爲硬化的道德主義。

約翰·福斯特·杜勒斯

主張「巨型報復」（Massive Retaliation），在艾森豪政府中擔任國務卿的杜勒斯，是一位長老會牧師的兒子。在普林斯頓大學求學時，即具有馬基維尼主義（Machiavellismo）的傾向，「美國幾乎是唯一具有講道義資格的強大權力國家」。傑出的外交家庭背景，他在三十歲時，即受過律師訓練，以英國和會代表參議身份，隨同威爾遜總統前往巴黎。

杜勒斯相信僅憑圍堵政策只會招致權力的公開對抗，大部份政策只嘗試維持現狀，沒有顧慮到權力平衡的變化，完全誤解維持和平的需要條件。因此，他呼籲應發揮主動精神以對抗共產黨的擴張主義，自由世界必須「發展其意志和組織其工具，來對抗紅軍的公開侵略，並發動立即的報復」；使用「積極而良好指導的努力」，反擊蘇俄共產集團的奸詐、恐怖及暴力，才能維護和平。

在就任國務卿的一篇演說中，他說，「對於所有在共產奴役之下受苦難的人們，對於全世界懦怯和受威嚇的人們。讓我們這樣說：你們可以信賴我們。」這種論調被視為是對蘇俄的挑戰將採取強力的政策。在他的努力之下，其外交上的特徵，就變成強硬的軍事態度和必要時不惜一戰的決心。並且也首先認清，東亞國家正如一系列骨牌（row of dominoes），當共產黨佔領鄰近地區時，他們將隨之而崩潰。一九五四年成立的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更證實的，杜勒斯是把實力擺在最前端的。

約翰·甘迺迪

憑著家世大名及具有吸引力的性格，使得甘迺迪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總統。在參議員任期內，他批評杜魯門政府對於反共鬭爭的表現，欠缺一股熱情和勇氣；指責國務院應對中國的淪陷負起責任。當冷戰在五十年代日趨強硬時，嚇阻主義也逐漸的抬頭，成為甘迺迪政府外交政策上的主流。在任期內，他竟以悲劇化的方式結束生命，留給美國和世人無限的懷念。

在早期的外交思想上，甘迺迪以「武力哲學」為外交上的政策，相信蘇俄已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只有依賴優越軍事力量和使用它的堅定決心，才能確保美國的安全。在「讓我們再振作起來」的口號中，他採取強硬而現實化的作風，以面對蘇俄的挑戰。在古巴豬灣事件失敗後，更使他下定結論：「只有堅強，只有勤勉，只有堅決，只有勇敢，只有遠見的人，才能決定我們鬭爭的真實性質，才有生存的可能。」

古巴飛彈危機的發生及處理，甘迺迪應用高度的技巧，使黑魯雪夫撤回在古巴的飛彈，把世界從毀滅的深淵中救回來。却同時也使得他對核子時代的戰爭或和平問題，表現一種較成熟的見解。他檢討發現國際事務並非如其所想像的單純和馴服，在作此深刻認識後，一個二向度（Two-dimensional）的世界就轉化為多元化的世界（World of diversity），「未來的世界有足够的餘地可以容許不同的經濟制度，政治信條和宗教信仰，但却被對他人的尊重，和對世界秩序的忠忱，所聯合在一起。」這是甘迺迪對孤立主義的警告，也是他未完成的理想。

亨利·季辛吉

季辛吉，一位美國的梅特涅，一位秘密外交的推行者，也是一位七十年代的風雲人物。出身於哈佛大學的博士，早年的經歷極為平凡，猶太後裔，且離過婚。這些事實並沒有動搖他的外交地位。尤如尼克森對他所說：「說老實話，假使沒有你，我真不可能想像這個政府會變成什麼樣子。」

季辛吉是一位把學術理論帶進白宮的國務卿。在「一個重建的世界」(A World Restored)這本書中，他反覆強調當一個國家希望絕對安全時，其意義也就是其他一切國家都將絕對的不安全。」在「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一書中，他駁斥杜勒斯「巨型報復」對抗蘇俄擴張的政策，如果僅依賴核子報復，將使美國陷於一種狼狽的地位，而限於非法的選擇。在「選擇的需要」(Necessity of Choice)中，他認為假如不改取甘迺迪所提倡的彈性反應戰略，則美國會立即遭受攻擊的危機。在全面權力平衡的基本架構裏，對於克里姆林宮擴張的威脅，他確信若能保持

堅定立場，則可以逐漸勸誘革命國家變成合法國家，而不需威脅他們的存在。

由於打有限度戰爭，美國羣衆厭戰的心理，加上民主黨所控制之國會的妨礙，越南問題遂成爲美國的一大包袱，也是環繞在季辛吉頸上的枷鎖，同此想急於擺脫這個累贅，似乎已在世人意料之中。經巴黎和會的停火協定，在「光榮的和平」的叫聲中，越南問題就成爲歷史的一個註解而已。

從這十位外交官的評介裏，可看出雖然每個人因背景、時代不同，而主張或制定出不同的外交政策，但不難摸索出現實國際政治依舊以權力作爲區分強弱的標準。「第三世界」的出現，在某些場合上，或許發生一些牽制力量，但就整體而論，這個世界仍舊只是二個超級強國的對峙。「強權即公理」的原則，並沒有在國際舞臺上消失，反而更加明白顯著。

中美之間的關係，在這五、六十年當中，變化起伏很大。在我們危難時，美國基於本身利害，並不一定願意伸出援助之手，有時候甚至推石下井。講求道德正義是理論上的一種見解，現實的外交政策若不允許我們再抱持此種觀念，在美國外交原則是如此富有「彈性」之際，爲什麼我們還要墨守成規呢？